

編後語

這些日子真是熱鬧非凡。美國總統難產；台灣新總統面臨彈劾，又真真假假地拷貝了一幕白宮式緋聞；日本內閣在「不信任案」中掙扎；秘魯總統突然宣布辭職，國會卻堅持將他罷免……。事件接踵而來，世界有點令人暈眩。在這個人們不斷激動興奮、又迅速冷淡遺忘的時代，一切似乎都是過眼煙雲。看着剛剛編好的「高行健特輯」，包括「二十一世紀評論」和其他欄目中的相關文章，心頭不能不掠過一絲疑慮：一個多月前被沸沸揚揚地評說與爭論的這個「熱門話題」，現在會不會是一杯已經涼下來的茶呢？

不管怎麼說，興奮也罷、失望也罷，支持也好、尷尬也好，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變易、也不能抹殺的大事，它之將會引發持久而且不斷深入的討論和反思，是必然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本期歧見紛呈的「高行健特輯」只不過是一個開始。魯迅早在1927年就說：「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那不但反映了他的傲氣，也點出了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事實上，70多年來，漢語作家「如何被世界承認」的焦慮一直在不斷加劇。當前對高行健獲獎的爭議，也正是圍繞着「承認的政治」。張旭東認為，高行健的作品無論好壞，都是次要問題；關鍵是他的獲獎，只不過是西方價值觀及其文化生產機器「承認」當代中國文學方式的一種示範。朱大可解讀他稱之為「中國諾貝爾獎抵抗運動」的內涵：中國人獲獎是直接顯示中國人的卓越；不獲獎，則通過西方人的偏見和打壓，也間接顯示中國人的卓越。這個民族主義悖論反映出，中國人亟需來自西方的「承認」，用以照亮自己飽經創傷的面貌。這個特輯中還有包括高行健在內的許多其他作者，從更具體細緻的非政治話語，討論作家與文學、作品與時代，來彰顯高行健及其文學創作的內涵。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者，如陳曉明、趙毅衡、樂黛雲等，都是在高行健獲獎之前就開始研究和高度評價其文學創作的。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徐國琦和陳時偉的兩篇論文，一反以往中外關係史文章的枯燥無味，十分生動曲折，當然也涉及中國民族本位的確認和如何能被世界承認的問題。夏曉虹由晚清興女學談滿漢矛盾，周建渝從「色誘」重讀白娘子故事，劉昌元梳理歷來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批評與維護，那都涉及女性意識的歷史視野；至於吉川健一則從豐子愷和竹久夢二的關係談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漫畫的興起。這些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最後，還要向讀者特別推薦徐貢的文章。這篇文章論述當代東歐知識份子對極權主義的思考，早已超越了悲情揭露，而轉化為包括自身在內的文化內省。這應對當今中國知識份子有不少啟示：面對各種理論爭議，我們更需要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知識勇氣和睿智。